

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¹

——T20 秘鲁会议综述

孙靓莹 宋锦²

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海外分论坛“包容性增长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发展中国家合作与共同繁荣”于2016年4月25日至26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此次海外分论坛是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T20（Think tank 20）首场在G20成员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举办的论坛活动。在此次会议中，来自国际著名智库、国际组织、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学术界的近40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会、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泛美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印度智库 Gateway House，以及来自西班牙、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越南等国家的代表分别在会上作了国别案例分析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次会议共分为四个议题进行，包括：（1）发展中

¹ 本文即将发表于《经济学动态》。

² 孙靓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家的合作与共同繁荣；（2）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发展议程与金融资源；（3）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以及对可持续基础设施影响；（4）区域金融合作与融合。秘鲁央行行长维拉德(Julio Velarde)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做了题为《理解全球治理》的主题发言。会议中，专家们依据各国发展经验以及自身专业研究领域，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和讨论。

一、 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繁荣面临挑战

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发展问题的核心。来自哥伦比亚高等教育与发展基金会（FEDESARROLLO）的执行总裁 Leonardo Villar 教授介绍了拉丁美洲未来经济走势，认为财政收入缩水将阻碍政府部门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及政策实施效果。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汇率大幅贬值限制了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经常账户与财政账户双赤字的情况下，潜在增长水平受到极大的限制。要走出目前拉美经济的困境，应重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作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拉美地区国家若想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提升教育质量；提高贸易开放度并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解决各国以及地区收入不平等；提高金融包容性及金融深度；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产品提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来自韩国 Kore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的 Heungchong Kim 博士认为，虽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会对该国增长水平和方式产生影响，但最终一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该国的改革力度和措施。如果政府在进行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能力很低，那么经济规模越大，改革越复杂也就越难以取得成功。因此经济规模应配合该国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与实施效果来综合看待。Heungchong Kim 博士分享了韩国经验。其中包括大型产业和公司发挥主导性作用，特别是主导在追赶型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一国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须忽略垂直一体化而重视加入全球价值链。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公私两部门的合作正确处理民众对福利国家的需求。在发展援助项目的开发规划方面，应由受援国自主决定。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上，

韩国积极参与了地区性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应对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挑战问题。

经济增长之外，就业、教育、社会发展等更多能够反映包容性增长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来自南非 Human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的代表 Jaya Josie 博士提出了经济发展“恶性循环”问题。以印度和南非为例，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快速增长并没有改善人民生活及社会公平，经济增长没有为国民带来就业机会，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虽然增长是减贫的必要条件，但增长并不总是能够提高人口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一些增长就体现除了“无就业增长”的特征。从南非的经验来看，现在南非国内最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机会在于棚户区改造以及民众可负担的住房项目，在南非国内至少需要 1300 万套的住房，这方面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都非常庞大。此外，在增长、清洁饮用水方面，南非国内也存在着很多发展机会，这些项目都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发挥乘数性的作用。来自印度 Gateway House 的学者 Akshay Mathur 博士认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要。从印度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接受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比一般基础性学科毕业生更受到经济的欢迎。随着基础设施的修建以及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需要的是包括卡车司机等在内的劳动者，而现行教育体系培育的诸如社会学毕业生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这方面，印度政府还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Heungchong Kim 博士认为，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飞期间，政府并没有专门将人力资本的培养看作是一项专门政策，当时的政府也没有足够的专项公共资金对此进行支持。在韩国起飞期间，大多数的民众教育水平还仅仅停留自小学阶段，只有极少数的精英拥有学士以上学位。在没有充足公共资金的情况下，韩国政府通过制定向教育倾斜的税收减免政策鼓励私人投资进入教育系统。随着这项政策的推行，韩国逐步在十多年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初中、高中及大学教育体系。从总体上看，这是逐步递进式的过程，并注重吸引私人资本的参与。

二、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及其复杂性

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繁荣面临各方面巨大挑战，充足的资本投入、尤其

是持续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有巨大的需求，而且包容性增长框架对基础设施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代表们认为，未来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发达经济体中之前忽视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老化基础设施项目更新升级，第二是全球经济中结构性改革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在未来 15 年内，这一资金需求将达到 75 万亿美元，其中 70%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投资必将在未来对增长、发展以及地球其后产生深远影响。代表们同时指出，尽管基础设施项目对各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全球市场中，基础设施项目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究其原因，也许各国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都存在着政策体制以及融资能力方面的不足。从政策方面而言，各国目前几乎都缺乏综合性、与现行其他政策网络相一致的总体投资战略，因而无法从国家层面上建议系统化的国家制度，用以选择、审批、启动此类项目。例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在印度的失败率高达 40%，而拉美地区也并没有更为优异的表现。来自越南 Centr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CIEM) 的代表 Dinh Trong Thang 认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融资面临很多挑战，具体表现为缺乏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能力与渠道、公共投资管理系统薄弱、投资效率低下；此外，项目选择能力弱、建设成本高昂、项目无法按时完成，以及项目建成后运营不利及资产保值增值等都是可能面临的问题。来自美国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代表 Amar Bhattacharya 博士强调，政府政策风险是私人部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项常见风险。在可持续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各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化石能源补贴、以及缺乏碳排放价格是重要阻碍。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中，应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投资战略大多数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相脱离，对可持续性采购的应用不够。来自墨西哥 Centro de Investigacion para el Desarrollo (CIDAC) 的代表 Jorge Ramirez 博士指出，全球化石能源补贴在 2014 年已经达到了 4390 亿美元，而这一数额在 2009 年 G20 以及 APEC 会议做出承诺时仅为 3900 亿美元。全球各国应联合起来，协同配合取消在这方面的补贴。

导致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产生资金缺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的徐奇渊副研究员认为，目前国际发展融资面临的缺口既有供给

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在资金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水平较低加大了投资者风险。在资金供给方面，发达经济体内部经济危机以及财政整顿均降低了投资者提供融资的意愿。在融资过程中，各国主权信用评级也会极大地影响融资效果。据测算，在全部融资缺口中，18%的资金需求没有主权信用评级，44%的主权信用评级为投机级别，另外只有38%是属于可投资级别。这阻碍了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吉野直行（Naoyuki Yoshino）教授指出，投资回报率水平也会对融资产生影响。以亚洲为例，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很大，但是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很低，所以存在大量的投资缺口。在规划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上，需要考虑项目建成后的自身造血能力，包括带来投资者回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私人投资者投资、以及提高当地工人就业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投资项目的选择应该摆脱就项目论项目的困局，应进一步考虑如何推动本地区经济更好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Amar Bhattacharya 博士认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国际发展融资中最大的问题是国际银行正在大幅度地退出这些融资活动，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初期阶段；而国内银行则大多面临着由于贷款坏账而引发的融资资金枯竭问题。以印度为例，过去国内银行对项目有大规模的投资，目前由于贷款坏账等原因，很多投入资金都无法收回。银行的参与虽然并不是万灵药，但它们确实构成了融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银行为项目初始阶段提供建设融资之后，项目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可以寻求证券化或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但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机构投资者进行的投资都非常有限，这也为多边开发银行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目前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已经相对较低，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享受到这种好处，而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投资的可持续性。

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供给、需求也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不同的资金提供者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角色、作用天然地存在差异性。吉野直行教授指出，从资金来源角度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预算、国有银行出资、国内投资者以养老金和保险金等投资、海外投资以及官方发展援助等渠道。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需要长期投资者的参与。大多数银行存款的周期仅为2-5年，而对于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来说，他们的资金存续期较长，

更适合投资周期较长的项目。世界各个不同地区资本市场资金结构的不同，也决定了不同地区的资金供给情况。以亚洲为例，大多数资金都是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存在。而对于拉美地区而言，养老金基金以及保险基金在金融机构资产中的比例较高，资金可用于投资的周期也相对较长。

可持续性基础设施项目在不同阶段面临的风险有所差别，因此融资模式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特点。 Amar Bhattacharya 博士指出，从现金流周期来看，在项目准备阶段，项目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与政治风险、达到环境保护标准风险以及项目规划风险；进入建设阶段，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及政策风险以及建设风险；在运行阶段除了上述风险外，对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产品的需求、项目运营及相关政策风险则成为最主要的方面。与此相应，在项目准备阶段，由于需要进行可行性调研和前期投入，长期资本或公共资本进入非常关键；项目进入实施期后，可以通过股权提供者或债务供应商为项目融资；项目建设完成并开始运营之后，可以对项目进行再融资。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都是绿地投资，即项目建设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在项目初期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由于初始阶段未知风险水平很高，这一阶段几乎没有外来资本进入项目，项目资助方承担了项目资金提供的责任。这一阶段的两大资金来源就是项目发起人（来自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他们都为项目提供了股权融资。这一阶段的债权融资一般来自于银行部门，因为银行有能力进行项目监控，并根据项目的具体运行情况逐步提供资金，无需像发行债券那样在初期就承担全部风险。此外，由于不需要纳入很多参与者，银行进行融资结构重组也很容易。因此，在项目启动阶段，银行应成为融资的主体。

三、寻找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来源：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作用

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人类社会三大挑战——重振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保护地球未来——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手段。在目前各国货币、财政及汇率政策措施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可持续性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有助于重振经济，并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效果除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间接地通过溢出效应促进

当地中小企业发展，拉动私人部门投资以及劳动就业。

在为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融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 Akshay Mathur 博士认为，政府在金融领域改革会对发展融资产生长远的影响。以印度政府为例，印度银行对发展融资的投入在 1971 年占比例约为 2%，到了 1993-1994 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约 15%。1991 年，印度开启银行体系改革后，国内自由化进程与开发融资机构发展背道而驰，因为当前国内的重点已经转移到银行的商业化以及私有化进程之中，IMF 为多数国家设计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也并没有在印度发挥显著效果。此外，由于农业改革措施无法落实以及对农村的信贷提供不够，阻碍了农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目前印度正在实施的“总理人民财富计划”实施后，旨在提高金融包容性，提高对农业信贷、农业保险的重视程度，其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观察。Amar Bhattacharya 博士认为，政府部门的投资决策可能根据政治家的任职期限制定，但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建设期和存续期可能会持续几十年。这种不一致性可能导致项目的盲目上马，也可能出现决策被无限期搁置。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都是由地方政府计划而非中央政府制定实施的。地方与中央在角色和考虑内容上的不同会使决策更加复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指出，政府对基础设施项目的管理不仅包括技术和经济层面，也包括对其执政能力的要求，如何平衡地方与中央之间、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高超的执政艺术。Amar Bhattacharya 博士就此举例指出美国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艾森豪威尔时期推行跨洲高速公路体系建设时，曾经遇到来自各州议会的强烈反对，这就是地方与中央权益冲突的典型案列。与此相比，20 世纪 90 年代的拉美地区一度出现了公共投资下降、私人资本拒绝进入的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资金的缺乏，而在于拉美地区缺乏稳定的、可预测的行政管理体系。一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周期通常会达到 20-30 年，连续稳定的政治环境至关重要。要想吸引私人投资者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政府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引入私人部门对于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很有必要，但应合理规避私人部门的市场化力量与包容性发展的不一致性。 Jaya Josie 博士强调，将 PPP 引入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因为政府部门的资金不足，而是因为私人部门具有

较高资金运行效率从而能够使基础设施建设受益。在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中，关键点在于对项目风险进行管理和把控。从本质上说，基础设施建设的最终出资者只有两类，其一是最终用户，其二是政府部门。当风险升高时，私人部门参与项目的要价提高，政府将不会有动力将项目交给私人部门来做。例如，在非洲某些国家，建成电站的成本过高会最终导致电价飞涨，一般消费者无法承受，这给政府带来的负担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将私人部门引入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也考验政府对于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参与到具体项目的把握能力。来自秘鲁太平洋大学的 Roberto Urrunaga 教授也指出，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基础设施项目开发的总体规划、相关的政府政策及法律法规都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到位，需要改善在实践中的政策协调、简化行政手续、加强对政府官员的能力建设等。

四、多边发展融机构为可持续基础设施提供融资

多边开发银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除提供资金支持外，能够提高项目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 Amar Bhattacharya 博士指出，多边开发银行在资金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目前，全球多边开发银行所拥有的资金总量为 6800 亿美元，已经投资的资金总额为 700 亿美元，这些投入中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比例较低，但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如果能够将多边开发银行中的投资增加 350 亿到 500 亿美元，加上杠杆作用后，每年可以额外增加 1500 亿美元的增量贷款。多边开发银行的融资结构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结构之一。因为在整个项目中，多边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是整个项目实收资本的 5%。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进一步动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存款、资金以及外汇储备，让其物尽其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 Sven-Uwe Müller 博士认为，虽然内容和机制不尽相同，各多边开发银行在具体项目开发中都会实施环境保障的标准、专门的环境与社会保障部和复核与投诉部门。环境与社会保障部门的资金预算独立于集体项目，从而保证该部门作出客观与公正的评价。这三层体系的设定能够保证多边开发银行在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中保持相对较好的诚信度。以拉美地区的可持续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例，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与泛美银行（IDB）合作，自 2014 年开始设定包括经

济、社会和环境三重维度的一系列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同时以治理作为支撑三重维度的基础。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方面，必须建立包括各层次在内的良好治理机制，保障整个建设过程的透明性、可问责性以及可测量性，发挥各部门协作的合力。在此基础之上，要综合三个维度的内容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使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获得最大收益。根据 IDB 在拉美地区的做法，在考量可持续发展维度时，他们引进了哈佛大学的可持续性基础设施 Zonfnass 项目中的愿景评级系统（Envision Rating System）进行考核。来自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TEPAV）的 Bengisu ÖZENÇ 女士进一步强调，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开发需要与可持续性、包容性发展等多维度国际议程相结合，嵌入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目标。Jaya Josie 博士提出，在非洲很多国家，抛弃自然资源禀赋的考虑去谈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盲目去开发风能、太阳能而不去考虑火力发电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各个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对此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当地情况，给出解决方案。多边开发银行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不一定是通过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以高效的方式将城市垃圾转移到专门的垃圾处理站，虽然不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仍然对一个国家的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及其力争达到全球气候减排目标做出贡献。

多边开发银行在区域融资合作与融合的过程中能够起到引领和凝聚作用。 Amar Bhattacharya 博士认为，对于合理应对阻碍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的政府政策及制度、动员私人部门为可持续性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发挥自身独到作用。多边开发银行的参与传递了投资者信心，在项目初期以及项目完成阶段鼓励其他资金来源的共同参与，并提供相关融资工具。此外，作为诚信的经纪商（honest brokers），开发银行可以将政府、私人部门、投资者、公民社会有机联系起来，帮助建立一个可复制、可测量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模式。通过多边开发银行的努力，也可以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向更加可持续、更为环保的方向迈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低碳减排方面。多边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私人部门和气候基金等多参与者共同构建了多边开发平台，并利用已有及未来科技创新的融资工具，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稳定资金。他同时指出，为满足新的大规模的融资需求，多边开发银行所发挥作用也在加强，所扮演的角色也将进一步转变。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国

家开发银行可以发挥的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提供能力建设和体制改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投资管理体系，其中包括对主要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进行的环境影响测评、成本收益分析、对环境社会影响的事前评估，进而提高主体规划的设计质量。第二，提高地区内对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彼此协调。共同提出有关地区性可持续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总体规划，加强各国之间在地区可持续性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沟通与交流。第三，创新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政府投资以及官方发展援助是创造有利融资环境的催化剂，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借此引导私人投资流向气候变化以及绿色增长等领域，同时推动技术转移、试点项目及最佳实践的共享，推动基础设施、发电站等项目的 PPP 模式创新。此外，对新融资产品的开发和实验也是多边开发银行发挥影响的重要方面，以基础设施债券、绿色债券为例，均可以推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第四，推动可持续性基础设施融资。目前在全球资本市场领域，世界储蓄金额并不低，但是对如何将储蓄转化为实际投资需求的投资机会却存在着切实风险，开发银行在将存款与投资需求对接方面存在天然优势，能够以乘数倍的放大效应撬动私人部门资本的参与。

五、G20 如何对完善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G20 的发展正在经历两个主要变化，一是角色从应对危机转向长期治理；二是所探讨的政策从周期性政策逐步转化为结构性改革。G20 今年的主题“推动各方共同构建创新 (innovative)、活力 (invigorated)、联动 (interconnected)、包容 (inclusive) 的世界经济”也反映出这些变化趋势。在澳大利亚峰会期间，G20 平台上成立的基础设施中心也将对可持续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全球开展发挥重要影响。尤其是基础设施中心可以通过总结各国最佳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不过，很多项目的经验积累是基于具体某一个项目，并没有能够总结出超越项目产品之上的项目实践标准化流程。通过 G20 基础设施中心的工作，如果能够促进这些知识的共享，将会大大促进长期机构投资者投资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兴趣。

与会代表认为，G20 能够在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按照巴黎气候大会取得一

致的结果重申取消化石能源补贴的时间表；第二，推进金融机构碳排放交易；第三，将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划与各国增长计划以及国际自定贡献预案（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相联系；第四，利用 G20 基础设施中心以及 G20 基础设施工作组来共享投资框架设计，其中包括 PPP、私人开发融资动员、将基础设施开发作为一项资产类别以及确立满足高水平可持续标准的一系列具体项目；第五，促进多边开发银行加大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第六，推动及杠杆化利用气候融资等等。

此外，G20 峰会能够为较低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做出的贡献则主要包括：第一，明确各个成员国可以各自开展支持人均收入小于 10000 美元的国家实现巴黎气候大会目标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国内任务；第二，除了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外，将教育、发展融资与就业三个方面紧密配合，在教育、职业培训以及服务交付等多个领域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贫困水平较高的国家完善教育的“软”基础设施和服务交付。

当今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都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冲突利益共存的情况。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它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全球性质的，而且需要通过全球合作妥善解决。在此过程中，东方智慧可以为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给出新的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指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逻辑可以推动各国间的共赢合作³。这种东方智慧，不仅有助于推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而且对 G20 合作和全球治理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³ 孔子改进是帕累托改进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各个参与方选择和谐策略之后，所实现的一种强化的双赢帕累托改进。这是一种比帕累托改进更优的社会状态。参见赵汀阳著《冲突、合作与和谐的博弈哲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所有，未经本中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有违反，我们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联系邮箱：haobo.jin@hotmail.com